

浙东文化概论



曹屯裕 主编

宁波出版社

浙东文化概论

宁 波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马玉娟

封面设计 王海明

浙东文化概论

曹屯裕 主编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宁波顺风印务公司排版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5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ISBN7—80602—148—5/G·67

定价:15.00 元

序

我作为一个专业史学工作者，曾经翻阅过有关浙东文化的几本书，如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王凤贤、丁周顺主编的《浙东学派研究》，管敏义主编的《浙东学术史》等，这次又读了一遍曹屯裕主编的《浙东文化概论》。这些书都给我不少教益，现就曹氏的书说一点感受。

第一点感受，它向我们展示了浙东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按时髦的话，就是说它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把浙东文化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什么叫文化，有各种定义，有一本书上列举了泰勒、布朗、马利诺夫斯基、本尼迪克特、克罗伯、克鲁克霍恩、斯特劳斯、博斯、西厄斯、皮丁顿等十名学者的说法，虽然《辞海》上有“文化”的条目，但“在社会科学家看来，以上的释义（指《辞海》条目）都嫌不足，被认为还只是初步的、非技术性的。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时，对这样的名词必须赋予更准确的科学界说”。钱穆说：“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不管对“文化”怎么解释，《浙东文化概论》从浙东哲学、浙东史学、浙东文学、浙东教育、浙东藏书、浙东文献、浙东宗教、浙东陶瓷等八个方面，展现了浙东文化的丰富内涵，应该说是把方方面面都说到了，把我们熟知的名人、名事都简明地描绘了，以浙东哲学为例，把范蠡、王充、智顗、陈亮、叶适、王守仁、黄宗羲等说到了，而重点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

家范蠡、南宋陆学的主要传人杨简、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黄宗羲。

第二点感受，它在每一个内容里，点出了浙东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夏衍说：“远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生活在这里，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非常丰富，尤其是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从古以来，两浙不仅山川秀丽，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里讲的余姚河姆渡文化就成长在“正宗”的浙东——宁波地区。众所周知，浙江的开发是比较晚的，一般以晋室南迁为界碑：此前，“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如司马迁描述的那种‘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原始落后的荒服状态”，“在北方人眼里，这里还是一片文化落后、人迹罕至的不开化地区”；此后，由于三次大乱（魏晋的“永嘉之乱”、唐末的“安史之乱”与北宋末的“靖康之难”）迫使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中国经济重心的日渐南移，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于是在浙东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文化高潮，在全国占据了显赫的地位。“永嘉之乱”以后，山阴地区日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像《兰亭序》这一传世之作，就诞生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唐宋时期，浙东文化吸纳和消化中原儒家文化，切入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明朝中叶，王阳明高扬“心学”、开创“阳明学派”，使浙东文化呈现出为那时全国同类地区所罕见的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近代化，更贴近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

第三点感受，它把浙东文化的特点在导论与散落的各章中反映了出来。归纳起来，浙东文化有如下的特点：一是后来居上。从整体上讲，浙江文化是后来居上。就哲学而言，那是文化的灵魂，浙东的哲学源远流长，每一历史阶段都出现过具有全国影响的哲学家，留下丰富的著述。像东汉的王充，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像隋代高僧智顗，他创立了天台宗，成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最早的宗派；像明代的王

守仁，他提出的“致良知”学说，风靡一时，其影响续至近现代，而且涉及周边国家，他不仅是我国的，而且是有国际影响的大哲学家。就藏书而言，浙东的藏书事业的起步虽然比毗邻地区慢了一大节拍，但自两宋后异军突起，成绩骄人，一跃而成为浙江藏书的重要地区，尤其是明清浙东私家藏书，绝不比全国任何地区逊色。二是一专多能。浙东文化根基深厚，浙东的学者一专多能或全才的不少。像黄宗羲，他是“清代史学之祖”（梁启超语），同时又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又是藏书家；像全祖望，他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还是浙东文学的台柱），又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兼藏书家，还是文献家（浙东历史上第一位系统留意乡邦历史、文献的学者，称之为“一代文献宗师”）；像明代的王守仁，他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像清代的万斯同，他是史学家，又是文献家，等等。三是有创造性。有人说浙东的学者“造反”精神很足，或者说是标新立异，或者说是“叛经离道”，我觉得还是用“有创造性”来归纳一下为好。像东汉王充，以批判的精神，“崇实知”、“疾虚妄”，对当时泛滥成灾的“俗书”、“经书”与“奇怪之语”、“虚妄之文”进行全面批判，把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论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在当时神学化的儒家经学被立为官学、神学唯心主义充斥社会的恶浊氛围中，王充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反潮流”。像隋代高僧智顗，就是一位有创造性的佛教学者，他不是照搬印度的佛学，而是在佛性论上一反传统的认为佛性至净至善的说法，力主佛性兼具善恶；在修养论方面融合南北方佛学的不同风格，而主张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在世界观方面提出“三谛圆融”、“一念三千”。像南宋陈亮创立永康学派、叶适创立永嘉学派，理直气壮地举起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功利主义旗帜，一反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主流——重义轻利，直接开启了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像明朝王守仁创立的“王学”，打破了几百年来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独尊地位，“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况若拨云雾而见白日”，把读书人从

“此亦一述朱也，彼亦一述朱也”的沉闷气氛中唤醒，发挥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时代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像清代的黄宗羲，他提出了一个与传统对立的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新的价值标准——主张承认和满足合理的个体利益，变虚假的群体本位为个体本位，这个标准突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观念，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思想。浙东文化这种不囿于传统陈说、不随波逐流、极可贵的批判和创新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大放异彩，而且在今天仍熠熠生辉。

曹屯裕等人要我为他们这本著作写个序，我深感无以为力，只是写了上面几点感受，只能是抛砖引玉，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肯定会有许多收获。

杨树标

1997年5月于杭州大学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浙东哲学.....	45
(一)源远流长的浙东哲学	45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范蠡	48
(三)南宋陆学的主要传人杨简	50
(四)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	57
(五)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黄宗羲	69
二、浙东史学.....	80
(一)汉唐:浙东史学之肇始.....	80
(二)宋明:浙东史学之成熟.....	83
(三)清代:浙东史学之鼎盛.....	88
(四)浙东史学特点评述	95
三、浙东文学	114
(一)宋代之前的浙东文学.....	114
(二)两宋浙东文学.....	118
(三)元代浙东文学.....	126
(四)明代浙东文学.....	130
(五)清代浙东文学.....	140
四、浙东教育	155
(一)浙东教育的发展与演变.....	155
(二)唐宋时期的浙东教育家.....	164

(三)明清时期的浙东教育家·····	168
(四)晚清以来的浙东教育家·····	175
(五)浙东教育发展的经验·····	180
五、浙东藏书 ·····	185
(一)浙东藏书业的崛起·····	185
(二)两宋浙东藏书·····	187
(三)元代浙东藏书·····	189
(四)明代浙东藏书·····	190
(五)清代浙东藏书·····	194
六、浙东文献 ·····	206
(一)宋元:浙江文献学的滥觞·····	207
(二)明代:浙东文献学的发展·····	210
(三)清代:浙东文献学的勃兴·····	212
(四)近世:浙东文献学的高峰·····	222
七、浙东宗教 ·····	230
(一)浙东宗教的兴起与繁衍·····	230
(二)佛教在浙东·····	233
(三)道教在浙东·····	240
(四)基督教在浙东·····	245
(五)浙东佛像艺术·····	247
八、浙东陶瓷 ·····	254
(一)浙东陶器·····	255
(二)浙东瓷器·····	259
(三)浙东陶瓷文化的历史地位·····	276
结束语 ·····	282
后记 ·····	293

导 论

开展区域史、文化史或者将区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加以探析研究,无疑是当今学术界一个强劲的发展潮流。重视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赖以深入、拓展的逻辑选择,而另一方面恰恰反映了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人类对自身环境(包括自然与文化以及人与这两者的多维关系)的全方位觉醒。从方法论层面讲,着眼于区域个案分析与文化动态研究,有利于对“综合”、“分析”方法的认识深化。以往的研究,一般注重于“综合”方法,动辄以“宏观”入手,其好处可以给出一个总体性判断,勾勒一个一脉相连的过程,然而总不免过于抽象,缺乏鲜活的个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总体性判断”也会因没有具体的物相奠基而趋于淡化。这里,我们当然没有否定“综合”方法的意思,事实上,“综合”方法的应运而生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想说的只是,当“综合”方法一统天下而成为一种时风时,那么,它所营造出来的许多成果也必然是空泛、枯燥和浅薄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人们感到空泛、枯燥和浅薄的成果不但无补于本学科的发展与生存,而且也无益于社会的进步与前行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在方法论上作一番调整和革命了。不论是由于西方学术界(如法国年鉴学派提倡历史学从思辨到分析,从重视经济史、社会史研究逐步核变为对区域史、文化史的考察)^①的影响所及,还是我国学术界的自我意识,总之我国近十几年来不但大力开展了以区域史、文化史

为代表的“分析”研究，而且取得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我们相信，这项事业正方兴未艾。这里，我们仅用李佩先生为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大型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所作总序中的一段话说明“分析”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前一个时期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大多是偏重于宏观的论述，或者就某一个学派（如儒家）、某一种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进行研究，这当然也是很必要的。然而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而且又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而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都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这种各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对这些地方文化，进行历史地、具体地考察和研究，从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中找出中华文化的同一性，这不仅对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很重要的意义。”^③

由此可以看出，“综合”与“分析”是一对互相依存的方法论范畴，不可偏而废之，在某种意义上讲，“分析”或许是“综合”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从研究旨归层面讲，开展区域史和文化史研究，归根到底，就是要揭示某一区域经过历史累积层造而日益升华为该区域群体意识的“个性”和人类生活、存在的“特有方式”。正是这一“个性”与“特有方式”，在今天参与所属更大区域乃至国际社会的竞争与合作中，显得尤为必要。常言“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示在众人面前”、“我们的地区（或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多重合奏的格局中去”，说的就是我们具备有什么样的“个性”。唯有“个性”，才谈得上互补，也唯有“个性”，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共性。诚如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一篇关于社会发展的报告中所指出：

“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存在于个人与集体的需要和愿望之中。对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方式的选择本身，作为这些选择的价值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本质上讲完全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可以说，在文化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性：文化是发展的摇篮。……毫无疑问，作为发展的基础和目的，文化赋予各个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发展事业一种特殊和专门的风格。尽管发展中国家有少数人似乎接受为西方带来利益与价值的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发展道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对现代化和西方化统一学说的最恰当和最概括的回答。”^③

这段颇有哲理色彩的文字，充分说明了在寻求发展道路时保持文化“个性”的可贵。在我国，应该坚决反对为了保持文化“个性”而紧锁国门，但也不能容忍为了迎合某些国际潮流而一味地丧失应有的文化“个性”。同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也应该拥有同样的心态和原则。文化“个性”（用人文地理学的概念来表述即为区域“个性”）何来？它来自于历史，来自于时间的陶铸，来自于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生活与实践。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了解现实、把握未来，必须正视历史，必须重视区域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如果说上面所述是使我们致趣于浙东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的话，那么放眼浙东文化史研究现状之薄弱，则使我们感到了一份责任。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前辈学者已作出的颇有启迪价值但又相对褊狭的研究成果，以我们陋见，仅举出两个事实：一是以往所作的浙东文化史研究并不是当作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进行的，比较多的集中在浙东学派以及代表人物上，因而，迄今为止，尚未推出一部体系独立、涉及面较广的浙东文化史著作，这对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较大冲击力的浙东地区来说，

是件憾事；二是即使上述零星的或某一专题的浙东文化史研究成果，大都是从中国文化整体推衍到浙东学派或某个代表人物的，而不是从浙东地域社会特定环境中考察浙东学派或某个代表人物。这样，研究旨趣大相迥异，前者侧重于中国文化整体的演进和浙东学派或某个代表人物在这个演进中的地位与贡献，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但终究缺少区域“个性”；后者则侧重于浙东社会的自然变迁与浙东学派或某个代表人物产生、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进而推衍到中国文化整体的变进过程中去，这种研究相比前者肯定会多些泥土芳香。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方法上的差异，各有千秋，前者自上而下，后者自下而上，两者若能有机结合、声息相通，那么，浙东文化研究之荦荦大成者必源源不绝。就此，我们可以说说我们撰写这部书稿的目的了，这就是我们欲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梳理浙东文化的历史轨迹，探寻浙东地区的文化“个性”。当然，探寻浙东地区的文化“个性”，归根结蒂，是为了给中国整体文化研究（即“共性”）提供一个可供观察的视角。

主旨确定后，本书著者进行了多次晤谈与议论，集体商定写作中将要遇到的三个问题，即地域界定、文化指称与叙述体例。这里，把我们商定的结果一并交待如下。第一，关于地域界定。“浙东”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歧义的地域概念，因为自古至今，它所涵盖的子区域范围有很大的变动。大致说来，有三种类型：1. 以钱塘江（旧称浙水、浙江、制江、之江等）为界，把整个浙江省分成两片，钱塘江以东称为“浙东”，钱塘江以西称为“浙西”。这里的“浙东”概念约雏形于唐代（有“浙江东道”之设），定名于南宋，一直沿用至民国时代。宋室南渡，偏寓临安，于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始分“两浙路”为“两浙东路”与“两浙西路”，其中，“两浙东路”下辖绍兴府、庆元府（今宁波，旧称明州）、台州、温州、处州（今丽水）、婺州（今金华）、衢州等七个地方二级行政机构。以后浙江设省，将浙西的严州府（今建德）连同绍兴府、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衢

州府,并称“浙东”,是为旧志所称的“上八府”,与“浙西”“下三府”(即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相对应。应该说,这是“浙东”概念涵盖面最广的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大浙东”概念。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就是产生于上述各府、州的地方学术共同体诸如“金华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永康学派”(以陈亮为代表)、“永嘉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和“四明学派”(以杨简、舒璘、袁燮、沈焕为代表)的总称。²与“大浙东”概念相比,其涵盖面大为缩减,但仍含有今绍兴、宁波、台州、舟山等地在内的概念,我们称之为“中浙东”概念。这种概念的实际使用可上溯至清代中叶的著名史学批评家章学诚,他说: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自然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黎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阳明)刘(宗周),下开二万(万斯大、万斯同),较之顾氏,源远流长矣。顾氏宗朱(熹),而黄氏宗陆(九渊),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④

从字面上看,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似乎与前面所说的“大浙东”概念无异,但从其所列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及其师承关系看,显然,他所说的“浙东”已经特指宁绍地区了。后人将黄宗羲开创的,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七人为代表的,以史学见长、经学文学并重的,以宁绍地区为活动大本营的“不绝如线”^⑤的地域性学术共同体命名为“清代浙东学派”(或曰“清代浙东史学派”),也已经拘于“中浙东”概念了。截至民国时代,“中浙东”概念已基本普及于民间和学界了。³把“浙东”概念进一步缩小,特指今天的宁波及所辖各县(市、区)范围,我们称之为“小浙东”概念,这是从现在的宁波人常常以浙东人自居而其他市地疏于使用浙东概念的事实提升出来的。基于上述分析,兼及宁波行政

区划的历史性变动〔如今天属于宁波市管辖的余姚市和慈溪市西片，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属于绍兴市（府）管辖；而宁海县则原是台州市（府）的属地〕，本书所述区域范围以“小浙东”概念为主，必要时兼及“中浙东”或“大浙东”概念，即浙东文化史概念，实际上就是一部叙述今宁波区域历史文化发展为主的简史。

第二，关于文化指称。文化又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歧义的概念，以致有学者表达了对“文化概念”的一种恐惧心理，如英国学者罗威勒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⑥

这当然说得有点玄了，但确也道出了研究文化的艰辛。所幸的是，经过历代学者和专家的潜心研究，关于文化内核的认识在不少方面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意见，这便是我们进一步从事文化研究的良好基础。我们在众多的文化指称中，比较注意的有三种意见：一是把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类；二是把文化分为“宏观的”、“中观的”与“微观的”三个层次，其中“宏观的”层次是指人的所有活动，包括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观的”层次是指人的精神活动，并以学术、思想为其突出的表征，“微观的”层次则是指人的精神活动中有关道德、信仰、艺术、风俗等内容，几近于社会集体意识；三是把文化分为“物质”、“规范”（或“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类同于“物质文明”，反映人类在经济生活中的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与成就，“规范文化”（或“制度文化”）是指为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契约，尤以法律、规章、道德为其精髓，“精神文化”则集中反映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内的思考活动与智慧结晶。由此可见，不论哪

种定义,在文化指称上的交叉、互补和混同的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把包含物质活动、精神活动在内的文化指称称为广义文化,把特指精神活动的文化指称称为狭义文化的话,那么,本书所持的文化指称实际上是以狭义文化为主而稍稍涉略广义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这一方面是为了反映宁波文化特别是宁波史前时期至唐宋时代特有的区域特色(如“陶瓷文化”的兴盛、发展与式微),而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合作者现有研究旨趣与领域中某种偏好所致。写到这里,我们愿意告诉读者,我们这部书稿仅仅是一个起步、一个尝试,我们会以我们特有的方式继续深化和拓展我们的课题,不断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

第三,关于叙述体例。本书的合作者虽然有过多写书的经历与经验,但当我们凭着共同旨趣聚在一起商讨本书体例时,还是十分谨慎的。因为,这里我们要面对两个事实:一是我们在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上能够契合的程度;二是我们还要承担向大学生们进行专题宣讲的任务。应该承认,我们各个合作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虽然经营有年,但彼此间的交流则因囿于各种条件是十分不够的,因此,我们选择的是先由合作者各自按专题纵向撰述独立成章,然后合而成一书的写作体例。这样选择,有其好处,即可以在一定篇幅内展示作者的功力与见解,可以帮助读者对某一文化现象有一个较为系统、前后相应的总体印象;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首先因写作的分散性,必不可求得文字风格的一体化,其次,因不能分断代横排叙述,也必有不少重复之处存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好请读者诸君予以海涵了。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还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本书研究对象的时限主要放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实在,即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古代史范畴,可能有些合作者出于研究情节的需要,约略涉及到近现代宁波文化的某些情况,但这已超越了本书承担的任务。我们有个想法,经过若干时间的努力,对于宁波近现代文化发展情况,也会提出我们的意见来的。

为了给本书读者提供一些有关宁波区域的历史背景知识,以
对本书各个部分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下面我们拟对浙东文
化生成的地域背景、浙东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浙东文化的历史转
型三方面进行扼要的介绍。

(一)

首先谈谈浙东文化生成的地域背景。^⑦所谓浙东文化生成的
地域背景,实际上就是浙东区域的开发、发展的历史性表征。因为,
某一地区的文化现象既是该地区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产领域中总
体性创造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该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关系
互动的直接结果。所以,要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变奏,首先必须了
解该地区在历史进程中的总体变奏的实态。需要说明的是,在唐玄
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宁波地区单独设立地方二级行政建制——
“明州”以前,始终是以会稽郡(后称为“越州”,治所为今绍兴市)的
属地身份出现于古代典籍上的,因此,我们的叙述就从宁绍地区的
共同开发开始。

宁绍地区的开发,与其他地区的开发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
渐进与突进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
因素的影响,逐渐造就了迥异于其他区域的个性,进而影响到其文
化体系的形成和转换。

众所周知,“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⑧,所
以,最初的开发是从耕地拓殖开始的。如果以原始先民凭借天然工
具向大自然进行有目的的且有一定连续性的开辟,作为耕地拓殖
始点的话,那么,从宁绍地区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存来看,河姆渡
先民显然不是站在跑道的顶端。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宁绍地区耕地
拓殖史的起点定在距今七千年前的那个时代。

公元 311 年(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发生的“永嘉之乱”,严重震